

超越國族主義——日本「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之歷史教育與人權反思

丁巧如¹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作為創傷記憶及建構集體認同的場域，許多以戰爭為主題的博物館紛紛創建。然而二戰期間，日軍「慰安婦」的創傷歷史卻一直隱而未見，直到1991年，第一位出面指控日軍戰時性暴力的南韓受害者金學順（Kim, Hak-Soon，音譯）出現之後，各國受害女性陸續現身，這一段歷史才有被看見的可能。但日本政府不斷否認其戰時「強徵」女性成為「慰安婦」，更將戰時「慰安婦」歷史自教科書中抹去。相對於日本官方的作為，日本民間團體則廣泛蒐集「慰安婦」制度之史料，並於2005年成立了「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企圖超越國族本位主義，透過展示各國的「慰安婦」議題，傳遞史實並進而傳達人權教育理念。

本研究首先爬梳「慰安婦」議題的歷史脈絡及當代的倡議運動，說明日本社會對「慰安婦」議題的態度；並以「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為研究個案，透過訪談與展示分析，探討其成立的理念與展示內涵，分析其透過創傷歷史之反思及跨國界合作，以倡議女性人權，並勾勒出日本民間團體對戰時暴行的自省態度及其所面臨的挑戰，以此探討博物館在歷史教育及人權反思中的社會責任。

關鍵詞：「慰安婦」展示、博物館與女性人權、人權教育、創傷歷史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戰爭、人權紀念館類型的博物館。陳佳利 (2007a)

認為，紀念館的起源為各國有感於戰爭所帶來的創傷，而欲透過建立博物館來建構國家民族之主體性，並且緬懷戰爭的犧牲者。ICOM 國際委員會之一的 ICMEMO

¹ E-mail: ghosthithewall@gmail.com

(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 (ICMEMO 網站, 網路資料²) 指出, 紀念館的目的在於「紀念在國家的政治或意識型態迫害下所犧牲的受難者」。在此基礎上, 曹欽榮 (2011) 認為, 紀念館最主要的目的並非展出「被完成的歷史」, 而是展出更多距離當代社會不遠的事件, 以此借鑑, 警惕人權教育的重要性。綜上所述, 紀念館除了呈現歷史之外, 更具備道德、人權教育之意涵。然而, 卻也不可忽略紀念館所帶有的政治性。陳佳利 (2007b: 58-59) 將設置紀念館之目的歸納為: 「作為證據或正義未得伸張者; 感念善行、足以為社會表彰者; 加強社會之凝聚力; 為社會上多數人所共同經歷或關心者; 為國家歷史之教訓者及符合現存之政治權力與利益者」。Williams (2007: 129) 亦指出「紀念館在具體化事件中特別具有政治性效益」。由於人們如何回憶過去, 會影響其形塑現在, 戰爭、人權紀念館實際上是透過建構一集體記憶, 使民眾在反思災難的過程中, 凝聚民族意識, 進而促成族群的文化、國家認同 (陳佳利, 2007b), 因此, 全球各地陸續根據其自身的歷史脈絡設立不同的紀念館, 這樣的趨勢在 1980 年代快速發展。

然而, 以「慰安婦」為主題的紀念館則遲至 1990 年代末期才出現。由於戰時史料的缺失, 再加上「慰安婦」受害者戰後長達 50 年的噤聲, 因此, 一直到 1991 年, 南韓「慰安婦」受害者金學順出面指控日軍性暴力之後, 學者才開始挖掘「慰安婦」議題, 且隨著女性主義、人權意識的發展, 各受害國才相繼成立以「慰安婦」為展示主題的博物館/紀念館。南韓首先於 1998 年成立以「慰安

婦」為主題的「日軍性奴隸歷史博物館」(The Museum of Sexual Slavery by Japanese Military); 2012 年, 南韓第二座以「慰安婦」為展示主題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War and Women's Human Rights Museum) 在首爾開幕。繼南韓之後, 中國則有上海師範大學於 2007 年成立「中國慰安婦資料館」; 2010 年於雲南慰安所原址上的「董家溝慰安所紀念館」開放參觀; 2012 年, 位於南京利濟巷的日軍慰安所遺址終於得到當地政府的保存, 並討論於此原址上成立「慰安婦」歷史陳列館。臺灣則有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以下簡稱婦援會) 於 2004 年開始推動實體博物館之籌備, 而於 2009 年成立「阿嬤的網站: 慰安婦與女性人權虛擬博物館」。受害各國透過展示建構這一段曾被掩蓋的歷史, 除了保留戰爭創傷記憶、紀念「慰安婦」受害者之外, 更帶有人權教育之意涵, 那麼在「慰安婦」議題中作為加害者的日本又有什麼樣的作為呢?

即便各國受害女性紛紛出面控訴, 日本政府仍不斷否認其戰時「強徵」各國女性成為「慰安婦」, 更將戰時加害歷史自教科書中抹去。此外, 受到國族主義史觀的影響, 日本國立的博物館全未展示「慰安婦」制度及日本的戰爭加害歷史, 反而正當化戰爭發生的原因, 而公立的博物館/紀念館僅有 6 座展示日本的戰爭加害行為, 而這 6 座皆為市/區層級所營運的小規模博物館/紀念館 (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 2010), 但亦無展示「慰安婦」制度。換句話說, 日本國立、公立的紀念館大多僅展示對日本有利的資料——表述日本為戰爭的受害者, 而迴避陳述日本戰爭

² <http://icom.museum/the-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international-committee-of-memorial-museums-in-remembrance-of-the-victims-of-public-crimes/> (瀏覽日期: 2014/02/03)

期間的加害罪行。

相對於日本官方的作為，日本部分女權運動者組成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建設委員會，並於2005年成立「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以下簡稱wam³)，作為「日本首座揭示日本二戰時期的性暴力以及廣集『慰安婦』受害者與加害者證言之博物館」(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わたし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網站，網路資料⁴)，企圖超越國族本位主義，透過展示各國的「慰安婦」議題，傳遞史實、反思本國戰爭罪行以傳達人權教育理念。wam實際上與日本政府對「慰安婦」議題之立場相悖，甚至面臨日本當代社會眾多相異觀點之挑戰，因此，本研究以wam為研究個案，透過文獻分析、觀察、訪談與展示分析，嘗試理解：

- 一、wam 建構之脈絡及其理念為何？
- 二、wam 如何透過創傷歷史之反思及跨國界合作，以倡議女性人權？

三、在日本當代社會脈絡下，wam 有什麼樣的意義？

研究者在2013年6至7月以實習生的身份於wam參與特展製作，觀察館方如何詮釋「慰安婦」議題之史料；並透過訪談兩位參與館務之營運委員及兩位正式館員⁵(表1)，輔以展示分析，探究wam的展示理念及內涵。

wam 之建館脈絡

由於wam聚焦於展示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因此，本段落首先爬梳「慰安婦」制度的歷史脈絡，並以當代的倡議運動與日本政府對「慰安婦」議題之態度所交織出的日本當代社會為切入點，說明wam建館緣起。

一、戰時「性」的強迫徵集至當代「慰安婦」受害者創傷記憶的揭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發起太平

表 1. 受訪者資料表

編號	性別	職務	參與動機	參與期程	訪談日期
F-01	女	營運委員	關心「慰安婦」及女性人權議題，且支援中國「慰安婦」受害者。	2003年(籌備期)至今	2013/07/10
F-02	女	正式館員	關心「慰安婦」議題，特別是海南島女性的受害。原先為志工，後轉為打工性質，逐漸深入參與資料館工作後而成正式館員。	2009年至今	2013/07/08
F-03	女	正式館員	關心「慰安婦」及女性人權議題。	2004年(籌備期)至今	2013/07/13
F-04	女	營運委員	起初為工作合作關係，過程中發展出對「慰安婦」議題之關懷而於2013年初成為營運委員。	2003年(籌備期)至今	2013/07/10

³ 因館方以小寫wam自稱，為統一書寫名詞，本文沿用之。

⁴ <http://wam-peace.org/> (瀏覽日期：2014/04/30)

⁵ 由於wam不接受任何政府、企業補／贊助，僅接受個人會的支持、觀眾的贊助以及入館費，財務相當吃緊，因此正式編制的館員僅有2位，而日常館務一部分的營運則依賴無支薪的7位營運委員(包含館長)以及2位志工。營運委員一共9位(包含2位正式編制館員)，每月舉行一次營運委員會會議，討論資料館的營運方針，亦參與研究、展示製作、館刊撰稿、導覽等工作。

洋侵略戰爭，並在軍隊駐屯的亞洲各地設置「慰安所」，強迫徵集各地女性在慰安所中作為日軍的性對象，成為「慰安婦」(comfort women⁶)。二戰時期，日軍設置「慰安婦」制度的原因為何？最早被記載於史料之中的慰安所出現於西元 1931 年末的上海（蘇智良，2006），而慰安所被大量設置的時間則於 1937 年（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2008；李國生，1999）。1931 年，由於日軍強姦中國婦女的事件層出不窮，為了避免日軍沾染性病，因而選定上海虹口區的幾間日本妓院作為日本海軍的慰安所，提供日軍「安全的」性（蘇智良，2006）。至 1937 年，日軍占領南京之後肆無忌憚地屠殺、強姦中國人，此舉除了增強中國人的反日意識之外，國際亦出現譴責日本軍隊暴行的輿論。因此，為了避免敵區居民的反日情結及日軍因為沾染性病而耗損戰鬥力、防止軍情外洩、鼓舞日軍的作戰士氣等等，大量的慰安所被設置，以使士兵的性慾得以「安全」地宣洩（朱德蘭，2010；李國生，1999；楊雅慧，1994）。二戰期間，慰安所中的「慰安婦」人數究竟有多少？這些女性又從何而來？

在「慰安婦」人數的統計方面，由於日本在戰敗後，銷毀大量文件、資料，甚至在撤退時斬殺「慰安婦」，以避免其拖累軍隊腳步並掩埋事實，使得相關史實調查難以進行，因此戰時「慰安婦」總數一直沒有定論。朱德蘭（2010: 19-20）綜合各方說法指出：

千田夏光（每日新聞報社記者）估計，慰安婦總數約十萬人，其中，以朝鮮族人數最多。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推估，總數約在十萬至二十萬人之間，其中，也以朝鮮族居多。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估算，總數約計四十萬人。

李國生（1999）則分析南韓金日勉統計的資料後推論，戰時被強制徵調的「慰安婦」總人數約於 10 萬至 20 萬人之間。雖然「慰安婦」受害人數尚無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日軍慰安所廣布中國、朝鮮、臺灣、日本、菲律賓、印尼、東帝汶等國。

針對「慰安婦」的來源，董思齊（2005）認為可將之區分為 4 類，第一類為南韓女性，大約占八成；二為被強行帶走的中國婦女；三為從東南亞及其他國家徵召或拐騙來的女性；最後則是日本的娼妓和少數一般女性。不同國家的女性成為「慰安婦」的過程亦有所差異。日本籍「慰安婦」的來源是日本本地的娼妓，由於其健康狀況不如一般女性，恐使日軍感染性病而降低戰鬥力；又日本國內（殖民地則無）規定禁止二十一歲以下、非娼妓的女性成為「慰安婦」（吉見義明，2005）；再加上日本統治殖民地帶有種族歧視主義，戰前簽署《禁止販賣婦女兒童國際公約》時刻意規避對殖民地人民的人身保障（李國生，1999），因此，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臺灣的女性便成為其徵集目標。

在朝鮮、臺灣女性成為「慰安婦」的過程中，朝鮮軍司令部及臺灣軍司令部，

⁶ 然而，不論中英文，「慰安婦」(comfort women) 這個辭彙，皆不足以表徵女性在前線的處境。李國生（1999）提到，從字面意義來看，「慰安」二字帶有慰勞安撫的意味，是出自於個人意願的行為，「慰安婦」則意指出自內心，自願撫慰士兵的婦女。然而實際上，不若字面意義般充滿人性，其表徵了日本帝國主義思維（Hung, 2007），且在「軍、國家的集體輪姦、強姦制度」下（楊雅慧，1994: 57），「慰安婦」實際上被迫在前線提供性服務、身心靈皆飽受日軍的性暴力與奴役。然而，目前表徵這群受害女性的意符至今仍多沿用「慰安婦」，為避免混淆並統一書寫名詞，仍將戰時遭受日軍性奴役的女性稱作「慰安婦」，加上引號，期望讀者可以在閱讀過程中時時提醒此名詞背後的知識域暴力，並對知識建構的過程有所反省。

實際上為徵集之核心，由憲兵選定合作的業者，再由業者徵集女性、並將女性送往海外（和田春樹，1999）。而業者徵集女性的方式，以臺灣為例，主要透過總督府、地方警察、保甲、皇民奉公團體和特種行業業者所組成的動員系統（朱德蘭，2010）。李國生（1999）指出，當時在臺灣從事招募「慰安婦」的方式主要透過捐客（含臺灣、朝鮮及日本等籍）及役場（區公所）。日本政府藉由捐客為中介，以各種或欺騙或告知或引誘的手段招攬女性成為「慰安婦」；日本軍部亦透過役場，在其管轄地區中，以「奉公」的名義徵調臺灣年輕女子，至海外「軍部開設的食堂中做服務生」或「看護婦」（李國生，1999: 29）。朱德蘭（2010）綜合學者研究指出，韓國的女性則因誘拐、詐欺就業、憲兵逮捕、暴力脅迫、人口販賣或被以「女子挺身隊」（在製造軍需品工廠工作的女性，被稱為「女子勤勞挺身隊」）之名動員至前線而成「慰安婦」，其中又以「詐欺就業」為最大宗。不論以何種方式，中介的業者皆鮮少如實告知工作內容，而多以其他名義徵集臺灣及朝鮮的女性。除了日本本土及殖民地臺灣、朝鮮之外，淪為侵略地或占領地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亦有不少女性成為「慰安婦」，她們多被日軍強行擄走，抑或在收容所當中被日軍強行帶往慰安所，被迫成為日軍的性奴隸。

「慰安婦」在慰安所中的生活，會因慰安所的種類、地域之差異而有所不同。慰安所的類型可粗略分為3種，第一類慰安所是由軍隊直接管理、營運；第二是委託民間營運、仍由軍隊管理，上述二類僅供日軍和軍屬（日本軍隊制度中特殊的類別，不必上戰場，從事勞役工作）使用；第三則是由軍方指定的民間慰安所，這類型的慰安所一般大眾亦可使用（吉見義明，1992）。不論是在哪一種型態的慰安所中，女性被送進慰安所之後，便受到日

軍的嚴密看管，無法逃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各地戰事劃下休止符，「慰安婦」被奴役的日子才得以結束。

然而，日軍於二戰時期施加予女性的性暴力，並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被揭露。在既有資料中，首先揭露「慰安婦」議題的是日本《每日新聞》的記者千田夏光。1964年，千田夏光奉命整理戰地照片，並將之編輯為《日本的戰爭史》（日本的戰歷）時，在照片中看見行軍中的朝鮮籍「慰安婦」，因此開始調查「慰安婦」事件，訪查5年後證實日軍曾於二戰期間，在亞洲徵集女性成為「慰安婦」，並於1973年出版了《從軍慰安婦》一書（黃玉燕譯，1996），由於當時沒有受害者公開證言，因此此書並未在日本及國際社會中受到矚目。1972年，美軍移交沖繩主權予日本時，於原作為日軍基地的甘蔗園中發現了裴鳳基（Bae, Bong-Gi，音譯），由於裴鳳基並未擁有日本國籍，調查過後發現她原籍南韓（賴采兒等，2005），受到日本籍和朝鮮籍的捐客欺騙後，於1944年被帶往沖繩成為「慰安婦」，日本戰敗後則滯留於沖繩，直到被美軍發現。裴鳳基於1975年取得居留權，直至此時，她的故事才首次透過報紙呈現在世人面前（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2012），然而，此議題在當時亦未受到國際間的廣泛討論。就學期間曾目睹日軍強徵「慰安婦」的梨花女子大學尹貞玉教授自1980年開始調查「慰安婦」事件，她走訪日本北海道、沖繩及東南亞，聽取受害者證言、蒐集當地史料，並於1990年在韓國的報紙The Hankyoreh上發表其研究結果「挺身隊取材記」（山下英愛譯，1992；董思齊，2005），從此，「慰安婦」議題才開始在日本、在國際間受到關注。

1990年6月，「慰安婦」議題首次在日本國會當中被提起。本岡昭次在第118

回的國會預算委員會中詢問日本當局關於戰時「慰安婦」的強徵是否屬實，代表政府發言的清水傳雄則表示日本軍並未強徵，而為「民間業者自行攜帶女性隨軍而行」（国会會議錄，網路資料⁷），此番言論引起國際輿論的批評。同年 11 月，南韓的「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韓國女性團體聯合會」等 37 個民間團體，以解決日軍「慰安婦」問題為目的，組成「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開始深入調查日軍的戰時性暴力，並於 1991 年設置「慰安婦」受害者申訴專線（胡澎，2007）。由於日本政府否認其於戰時強徵女性成為「慰安婦」，因此南韓的金學順於 1991 年挺身而出，向世人傳達自己被迫成為「慰安婦」之遭遇。同年 12 月，包含金學順在內的 3 位南韓「慰安婦」受害者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及賠償。

1992 年 1 月，日本教授吉見義明在日本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中，發現了戰時由日本陸軍部與中國各日軍部隊往來之機密文件所集結成的《陸支密大日記》，顯示軍方參與女性的募集及監督、管理慰安所（董思齊，2005）；同年，日本眾議院前議員伊東秀子亦在日本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找到 3 通日軍要求提供臺籍「慰安婦」的電報，證實當時亦有臺灣女性成為「慰安婦」（賴采兒等，2005）。獲得這份資料後，婦援會於 1992 年 2 月 20 日成立申訴專線，臺灣政府並於同年成立跨部會臺籍「慰安婦」專案小組，並委託婦援會辦理「慰安婦」受害者的生活照顧與個案服務，婦援會訪查後，確認臺灣至少有 58 名受害者承認其戰時經歷（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在此同時，各國的「慰安婦」受害者接連出面指控日軍戰

時性暴力，而北韓、菲律賓、印尼等國的民間支援團體亦針對「慰安婦」問題，各自組成調查委員會。1992 年起，各國的「慰安婦」支援團體開始定期舉辦「日軍『慰安婦』問題亞洲連帶會議」，藉由國與國之間的串連，倡議女性人權。此後，北韓、中國、菲律賓、荷蘭、臺灣等國的「慰安婦」受害者相繼展開對日訴訟，然而，所有的「慰安婦」受害者對日訴訟案皆敗訴定讞，日本法院或以「超過追溯時效」，或以「國家無答責」（賴采兒等，2005）等原因宣判原告敗訴，使得受害的「慰安婦」一直得不到司法判決下的公理與正義。

二、以教科書問題看日本當代的國族主義歷史觀

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於 1991 年開始調查「慰安婦」問題，分別於 1992 及 1993 年公布兩次「慰安婦」調查報告。1993 年 8 月，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結果（即一般所稱「河野談話」），承認日本存有關於「慰安婦」的檔案資料，證實了日本政府、軍隊和「慰安婦」問題的直接關係，證明了「慰安婦」的強迫性質。河野談話除了反省日本戰時的性暴力罪行，更表示「我們不會迴避歷史，而會直視歷史教訓。我們藉由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將這樣的問題永遠銘記在心，並表明不再重蹈覆轍的堅定決心」（後藤乾一等編，1997: 18）。1995 年，首相村山富市於 8 月 15 日發表了反省戰爭、致力於和平的「村山談話」，表示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日本外務省網站，網路資料⁸）。

⁷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18/1380/11806061380019a.html>（瀏覽日期：2014/01/23）

⁸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07/dmu_0815.html（瀏覽日期：2014/02/03）

然而，1995年開始，對反省戰爭罪行的史觀卻出現了強烈的反動力，「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版歷史教科書編寫會」、「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的年輕議員會」等組織相繼成立，並將記載「慰安婦」問題、「南京大屠殺」等戰時罪行的歷史視為「自虐史觀」，強烈批判並鼓吹教科書刪除「不當描寫日本之惡」（如「慰安婦」記載），宣揚能使學童對日本為榮的歷史認識（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つくる会趣意書，網路資料⁹）。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特別調查員 Coomara-swamy 針對「慰安婦」議題提出調查報告¹⁰，次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建議日本政府對其戰時罪行負起法律責任，當時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卻在第136回國會預算委員會中表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僅以部分資料為基礎，並非全為事實，因此，在法律的層次，日本政府並無接受勸告之必要（国会會議錄，網路資料¹¹）。

日本的教科書採用審定機制，由文部科學省制定「學習指導要領」作為教科書綱要及規範（甘懷真，2009），然而，文部科學省往往為了配合政府政策，而對教科書的內容有不少限制。因此，受到政府態度的影響，擔心不獲選的教科書出版社，便自行刪除「慰安婦」之相關歷史描述，2002年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慰安婦」歷史記載遭到大幅縮減，至2006年，僅存兩家出版社仍留著不甚完全的「慰安婦」歷史記述（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

2011）。2007年1月，美國國會議員 Mike Honda 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受害者謝罪」之決議案（即為121號決議案），同年3月，首相安倍晉三在第166回的國會預算委員會中指出，並沒有政府及軍隊強迫女性至前線充當「慰安婦」之證據，狹義的強迫（如當局強闖民宅、綁架一般女性）都是無證據的，更表示在美國成為話題的121號決議案之陳述為誤認（国会會議錄，網路資料¹²），即便121號決議案通過亦不打算道歉。

針對日本歷史教科書在「慰安婦」議題上之漠視，2009年，各個要求出版社恢復教科書中「慰安婦」歷史記述的民間團體組成了「要求在國中歷史教科書內恢復『慰安婦』記述的市民聯絡會」，向社會進行宣傳活動，並要求文部科學省以及國會議員改善教科書審定及選用制度，更要求出版社在教科書或教師手冊內納入「慰安婦」歷史之記載，卻僅有兩家出版社採納。至2012年時，沒有出版社在教科書中明白刊載「慰安婦」史實，僅存一家出版社留有極不明確的相關描述（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2011）。2014年1月17日，日本文部科學省發表新的教科書審定基準，針對社會科的部分則由「不斷然記述未確定之事項」修改為「不強調特定的事項、必須加上政府立場以及最高法院判決的基本記述、近現代史中若未記載普遍性的（通說的な）見解，則須增加」（産経新聞2014/1/17，網路資料¹³）。由此，不

⁹ <http://www.tsukurukai.com/aboutus/syuisyo.html>（瀏覽日期：2014/01/25）

¹⁰ 調查報告中指出日軍於戰時建立的「慰安婦」制度是「軍隊性奴隸」制度，主張日本政府違反了國際人道法，認為日本應負起法律責任，須公開所有文件及資料、並向受害者謝罪及賠償，亦應查明、懲罰涉及「慰安婦」制度之戰犯，並透過歷史教育傳遞史實（Coomara-swamy, 1996）。

¹¹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36/1380/13602161380003c.html>（瀏覽日期：2014/02/04）

¹²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66/0014/16603050014003a.html>（瀏覽日期：2014/02/04）

¹³ <http://sankei.jp.msn.com/life/news/140117/edc14011711250001-n1.htm>（瀏覽日期：2014/01/24）

難想像 2016 年（2014 年審查申請，2016 年開始使用）以後的教科書皆會記載「慰安婦」受害者對日求償訴訟敗訴之因及政府對此議題的觀點，而加深日本民眾對於日本政府對「慰安婦」議題沒有責任或已全數解決之錯覺。

雷麗平、周嘉 (2006: 55) 指出，日本主流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皆「極力迴避侵略戰爭的性質與責任」、「蓄意淡化侵華日軍的戰爭罪行」以及「刻意強調受害而抹殺加害」，正呼應了甘懷真 (2009) 所言，所有國家的歷史教科書都不免成為民族主義工具，並承擔著型構國族歷史之教育責任。然而，歷史教育並非要施加特定觀點予學生，而應該在教科書上承載多元歷史觀點，讓學生探究各種歷史見解，日本政府卻利用教科書審查制度干涉歷史敘事過程，否認「慰安婦」制度的戰爭責任，並進一步定義出「普遍性」的歷史觀，建構以國族為基礎的集體記憶。相對於日本官方的作為，部分民眾及非政府組織則透過連署、集會、傳單、文宣手冊以及博物館展示，向社會進行「慰安婦」受害者之人權倡議活動，以下將討論日本民間相關的自省運動及博物館建構之過程。

三、wam 之建館緣起

1990 年代正值冷戰終止、亞洲各國的民主化以及女性主義意識及相關運動高漲，因此相對於日本政府之態度，日本部分民間團體如戰爭中女性受暴支持網絡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War-Network)、日軍「慰安婦」問題關西網絡 (日本軍「慰安婦」問題・関西ネットワーク)、解決日軍「慰安婦」問題全國行動 (Japan Action Resolution of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等組織則深省日本的戰爭罪行。1991 年後相繼出現的「慰安婦」受害者證言促使了日本民間部分民眾對於「慰安婦」議題及戰爭侵略罪行持著反

省之心態，並開始「慰安婦」聲援運動 (池田惠理子, 2012)，如「慰安婦」支援團體 (臺籍「慰安婦」受害者支援會、在日「慰安婦」訴訟支持會等) 之組成、「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開辦及 wam 之成立，倡議「慰安婦」受害者之人權，在這之中，松井耶依 (松井やより, 音譯) 扮演了一重要的角色。

松井耶依生於 1934 年，她對和平、人權和社會議題的關注源自於其父母致力於反戰的影響。松井耶依就讀東京大學外文系之時，獲得至美國交換學生之機會，她對於美國女性可以公開表達其看法感到印象深刻。其後，她轉往法國，卻面臨法國人對亞洲人的歧視，再加上她對法國民主感到失望，而搭船回日本。航程中，她造訪了東南亞，並震驚於亞洲 (人) 在西方殖民主義和日本侵略下，成為帝國主義資產的情況，因而結合自身在美法的學習經驗，走訪亞洲各國以擴展其視野。1961 年，她成為《朝日新聞》社會部的記者，並於 70 年代開始投身女權運動，逐漸接觸戰爭期間日軍對女性犯下的種種罪行，並關注戰爭中受害的女性。在體認到記者身份的限制後，她創立了亞洲女性協會 (Asian Women's Association)、亞太研究中心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日本戰爭中女性受暴支持網絡」等非政府組織，並於中國、韓國和東南亞各國，收集受日軍侵害的「慰安婦」受害者之證言和相關資料 (Yamane, 2010)。

2000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北韓的「從軍慰安婦」太平洋戰爭補償對策委員會、中國上海「慰安婦」研究中心、臺灣的婦援會、菲律賓女性人權亞洲中心、印尼的正義與民主主義女性聯合會以及日本的戰爭中女性受暴支持網絡等組織組成國際實行委員會，在東京舉辦「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模擬正式法庭形式，審判日軍戰時的「慰

安婦」制度，共有來自南、北韓、中國、臺灣、菲律賓、印尼、東帝汶、荷蘭和馬來西亞的 64 名受害者參加（VAWW-NET ジャパン編，2002a）。由於當代的戰爭及衝突之中，施加於女性的性暴力未曾停止，因此，除了審判「慰安婦」制度之外，亦舉辦「當代衝突中對女性的犯罪行為」國際公聽會，廣集當代戰爭中受害女性進行證言。法庭最後宣判已故的昭和天皇有罪，希望給予受害女性形式上的正義。由於民間法庭無執行懲罰之效力，因此僅能敦促日本政府向受害女性謝罪並賠償，此外，判決文中更基於「留存記憶、並為了不再重蹈覆轍」之因，建議各國「設立紀念館、博物館及圖書館，使人們對受害者和倖存者有所認知、並回復其名譽」（VAWW-NET ジャパン編，2002b: 437-438）。

2002 年 10 月，松井耶依發現自己罹患肝癌，在得知毫無治癒機會後，她決定捐出所有財產，以及自 1996 年以來，為了召開女性國際戰犯法庭而蒐集的「慰安婦」文書、照片及影像等資料，和 1991 年後各國受害者對日訴訟過程中所累積的資料，以支持資料館的建立（Yamane, 2010；胡澎，2007），期望透過釐清及傳遞戰爭加害歷史，使民眾反思當代社會中仍持續發生的、對女性的政治性暴力，以促進女性人權，更欲以此督促日本政府反省戰爭罪行。同年 12 月，對松井耶依建置資料館之想法有所共鳴的女權運動者，成立了「女性的戰爭與和平人權基金」，開始了建設資料館的募款活動（西野瑠美子，2003）。2003 年，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建設委員會開始進行籌備活動，如資料蒐集與整理（池田惠理子，2004）。除了內部活動之外，亦積極尋求建館空

間，但右翼份子的騷擾使其幾經搬遷並遭遇租設場地的困難，最後，西早稻田附近的奉仕園基督教組織，願意提供其二樓約 34 坪的空間予以使用。2005 年 8 月 1 日，歷時約兩年半的籌備，wam 於東京西早稻田地區開館。綜上所述，wam 的建立起源於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判決文，並在松井耶依理念的催化下成形，而開辦女性國際戰犯法庭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則成為資料館展示、教育及研究的重要根基。以下將藉由分析 wam 之展示內容，進一步說明其目標及理念。

wam 之理念及展示內容

由於各國「慰安婦」受害者年事已高，但日本政府及社會對二戰時的性暴力事實一直抱持否認態度，並使得「慰安婦」記述由教科書中被刪去，因此，wam 之首要目的便是傳承「慰安婦」受害記憶及歷史。其次，由於現今世界各地仍有許多女性面臨戰爭暴力的威脅，因此欲透過 wam 的成立以傳遞女性人權理念。西野瑠美子（2003: 1）便指出，「期望透過資料館的建立，確立女性人權、根絕戰爭及武力紛爭中施加於女性的性暴力，並調查被害者的受害狀況，成為性別教育的場域，而非僅是單純記錄戰爭的『記憶館』。」其最終目標則嘗試創造一個「賦權市民學習、思考加害的歷史，進而有所行動的場域」（池田惠理子，2006: 1），藉此促進和平的未來（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建設委員会ページ，網路資料¹⁴）。

由於現時戰爭對女性的暴力未曾停止，因此 wam 不僅反思「慰安婦」歷史，亦對現時女性受到的性暴力有所關注；具體而言，資料館的主旨為反對政治性暴

¹⁴ <http://www.wfphr.org/pre/sub/intro.html>（瀏覽日期：2014/02/09）

力，而其中最大規模的案例則為「慰安婦」制度，因此其以「慰安婦」議題為核心。然而，因期望擴及更廣泛的政治性暴力議題，故在館名上不冠以「慰安婦」之名詞，而命名為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除了館內的常設展、特展之外，wam 更出借結束展期的特展之展板內容，與學校、亞洲的「慰安婦」支援團體及相關博物館合作，藉由「巡迴展」的方式，向更多人傳遞「慰安婦」史實，因而帶有行動博物館之意涵。

館內展示分為常設展與特展，常設展區又可分為前廳展示、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展示區。受限於空間，因此與一般博物館以「物件」展示為主的方式不同，wam 以「文字為主，圖片為輔」的展板展示為主要手法。以下，藉由分析館內展示，並輔以訪談資料，更具體地說明 wam 之理念。

一、「與每一位受害者相遇」的資料館

進入館內之前，會在前廳看見一面紅磚色的倖存者肖像牆（圖 1），牆上置放著在各國女性團體的協助與協調之下而取得，來自臺灣、菲律賓、南北韓、日本、印尼、馬來西亞、東帝汶、荷蘭及中國等 10 個國家共 155 名的「慰安婦」受害倖存者之肖像及其姓名。訪談對象 F-01 於導覽時表示：

wam 籌備初期便決定在入口處設置這樣的意象。這面牆除了要讓觀眾知道戰爭期間有這麼多國家的女性受到日軍性暴力的迫害之外，更要使觀眾思考，為什麼這些女性挺身而出指控日軍戰時性暴力罪行？挺身而出又需要多大的勇氣？

戰後，父權體制下的貞操概念使得「慰安婦」受害者壓抑噤聲將近 50 年，在女性主義的發展和日本政府否認戰時強徵女性的催化之下，受害者們才現身於社

會大眾之前提供證言，但同時也要接受大眾投以各式各樣的審視眼光。這面牆實際上為 wam 的象徵，提醒著館方「這些勇敢的女性總是不逃避地直視著我們」，因此，wam 也必須直接面對這些女性的創傷，並努力在日本揭露「慰安婦」史實、落實正義，以回應她們的目光（池田惠理子，2005: 1）。展示說明當中，更明確地表示 wam 廣泛蒐集受害者證言，以使觀眾可以「在資料館當中與這些勇敢的女性相遇，傾聽她們的聲音」，並進一步理解「在這些女性背後還有抱持相同創傷的眾多受害者」，期望觀眾「感知這些抱憾殞歿的女性／少女曾經存在之事實」。這樣的展示方式，呼應了陳佳利 (2007b) 所指，由於肖像象徵了身份之取得及認同，因此，以展示肖像的方式，得以避免受害者消失於歷史洪流之中，並暗示資料館內之敘事以受害者（而非受害國）為主體。

前廳之中，與倖存者肖像牆對望的為「慰安婦」大事紀，以 1894-2005 的年表方式，輔以照片（慰安所照片、受害者年輕時的照片或戰後女性人權倡議活動之影像紀錄）、日本戰時公文資料、相關報導、受害者所繪之作品等等，再現由戰前至當代的「慰安婦」歷史。在戰前及戰時的部分，回溯自中日甲午戰爭開始之相關歷史，並終結於 1952 年的《舊



圖 1. 前廳所見倖存者肖像牆

金山和約》，以年表方式綜觀地敘述「日本和亞洲的關係史」及「『慰安婦』被害者的足跡」，藉此再現二戰期間亞洲的「慰安婦」歷史。戰後的「慰安婦」年表（如圖 2）則以二戰終止的 1945 年為始，wam 開館的 2005 年為終，透過「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社會運動與國際社會」以及「『慰安婦』受害者的行動」3 個平行視角的展板內容，爬梳戰後「慰安婦」相關歷史。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戰前或戰後，皆置入「慰安婦」受害者當時之行動（例如在戰時的部分，便置入受害者姓名、受害年齡、國籍、受害地點，甚至是受害情況；戰後的部分則著重於受害者公開受害經歷及對日訴訟等歷程），以大歷史與小歷史相互對照的方式，增添歷史敘事之面向，甚至將受害者在出面指控暴行後所繪之畫作置於其受害年份，彌補了其於戰爭期間乃至戰後近 50 年中被消抹的聲音，由此，呼應了 wam 期望觀眾「能夠與每一位的受害者相遇」之理念。

二、常設展：避免性暴力之重蹈覆轍

F-01 於導覽時指出，在日本當代，談論昭和天皇的戰爭罪行仍屬禁忌，故 2000 年舉辦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後，日本大多數媒體皆未報導法庭內容，僅有《朝日新聞》及《北海道新聞》做了很簡略的報導。因

此，為了使更多民眾可以得知法庭內容，開館後首次特展便展出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之概要，其後便將部分內容移作為常設展展示，包含在法庭中被判有罪的 10 名「責任者」、判決文、各國受害者證言、籌備法庭過程中蒐集的資料以及日、英、韓 3 種語言的慰安所地圖，以促進民眾對於 wam 的起點以及在「慰安婦」人權倡議運動中，落實正義的里程碑可以有所瞭解。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區（圖 3）之中，除了法庭概要之外，右側牆上亦掛置了韓籍「慰安婦」受害者姜德景（Kang, Dok-Kyong, 音譯）在韓國「分享之家」（「慰安婦」受害者照護中心）中所繪的畫作「為了和平，懲罰加害者吧！」之複製品。F-01 於導覽中對此畫作有進一步的說明：

由臉的長相就可以看出，畫面中被綁在樹上、遭手槍瞄準的人是昭和天皇，這幅畫帶有受害者強烈的仇恨情感，體現了受害者的心境。殘暴的主題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感覺可怕，但畫作中白色的鳥則象徵「慰安婦」問題可以被解決的希望。這幅畫是姜德景女士逝世前所作的最後一幅畫，而有專家認為「懲罰加害者」是療癒性暴力受害者心靈的契機之一。

姜德景女士在 1997 年逝世，無法親



圖 2. 戰後「慰安婦」大事紀



圖 3. 姜德景女士畫作複製品（圖片／wam 提供）

見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判決的正義，因此，館方將這幅延續姜德景女士願望的畫作，與法庭的判決文對望，以呼應其所企盼的正義以民間法庭的形式得以落實。

面對法庭概況之牆面，則展出「當代衝突中對女性的犯罪行為」公聽會中所蒐集的受暴女性證言（圖 4），當中標示了受害者之姓名、國籍、加害者及受害概況，將其對政治性暴力的批判眼光投射至當代。然而，即便在戰爭與衝突中受到暴力的女性得以出面進行證言，當中仍然有些受害者不願意提供真實姓名及肖像，因為她們擔心歸國後會遭到殺害。對此，F-01 認為：

即便日軍的「慰安婦」制度是一極大規模的犯罪事件，但卻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且日本至今仍拒絕承認此為事實，甚至將其遺忘，這對於制止當代性暴力是無用的，反而招致反效果。果然，不懲罰加害者、釐清加害事實，便無法杜絕性暴力。



圖 4. 公聽會中，受暴女性之證言。

wam 認為，公開被掩埋的歷史，是避免性暴力重蹈覆轍的最佳方式，因此，常設展中直接指出該為戰時「慰安婦」制度負起責任並受到懲罰的昭和天皇、東條英機（戰時首相）及日軍的姓名，並點出其犯罪行為。除此之外，亦期望透過傳遞日本戰時的性暴力加害行為，發展人權教育理念，避免戰時性暴力繼續在當代重演。然而，由於各地區的受害樣貌並不一致，因此，wam 一年選定一個地區作為特展主題，致力於調查、研究該地「慰安婦」受害狀況。

三、超越國族主義之各國「慰安婦」特展簡介

wam 的展示以特展為主，並將展示主題細分為地區型或議題型。甫開館時特展展期為 4 至 6 個月，一年舉辦 2 至 3 回特展，2007 年開始則將展期調整為一年，至今共舉辦 11 回特展¹⁵。與其他國家以「慰安婦」為展示主題的博物館強調本國受害經驗最大不同之處在於，wam 的展示超越國族主義，並觀照世界各地的受害者。由於每個地區的受害者都有不一樣的特點，因此 wam 每次特展聚焦於單一受害地區，並與該地的「慰安婦」支援團體合作，充份收集相關的史料、影像及受害者證言作為展覽的基礎、將其研究成果與學者專家進行討論，以再現該地的「慰安婦」受害歷史並呈現各地區受害女性的經驗。至 2013 年止，已展示的地區包含朝鮮半島、中國、東帝汶、菲律賓、沖繩（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網站，網路資料¹⁶），

¹⁵ 歷年展題分別為：(1) 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全貌——被害的「慰安婦」與加害者的責任；(2) 松井耶依女權運動全紀錄；(3) 被留置於各國的朝鮮籍「慰安婦」；(4) 日軍和印尼支配下，東帝汶女性的戰爭記憶；(5) 何謂「慰安婦」？中學生須知卻未知的二戰性暴力歷史；(6) 有一天，日軍出現了一——中國戰場上及慰安所中的性暴力；(7) 證言與沉默——面對罪行的前日軍；(8) 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後十年——女性的發聲改變世界；(9) 菲律賓女性——自被日軍踐踏的島嶼挺身而出；(10) 軍隊無法保護女性——在沖繩的日軍慰安所和美軍的性暴力；(11) 臺籍「慰安婦」的證言·無法抵抗而成為日本人的阿嬤們，見 <http://wam-peace.org/tenji/>（瀏覽日期：2014/02/10）。

¹⁶ <http://wam-peace.org/tenji/>（瀏覽日期：2014/02/10）

以及2013-2014年展出的臺灣的「慰安婦」議題。

除了以國家或地區為策展主題範疇之外，議題型特展則針對一議題（例如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何謂「慰安婦」以及面對加害罪行的前日軍等）進行討論，不避諱陳述日本戰時性暴力罪行，並展出受害者的個人生命史及加害者證言，貫徹 wam 「創造一加害與被害相互對照之場域」之理念。F-02 接受研究者訪談時指出：

在展出地區及議題的順序選擇上，通常先選擇擁有支援團體的地區，因為會有較豐厚的研究基礎；除了研究基礎的考量外，也會因應時勢而選擇展示主題，例如在2007年，因應當時首相安倍晉三對於解決「慰安婦」議題的負面態度，而製作了「為了中學生而做的『慰安婦』展」；而2012年正好是沖繩返還40週年，因而於該年以沖繩為展示主題。

綜上所述，wam 之展示並非以單一國家／地區為主，而超越國族主義，藉由跨國界合作，結合「加害國的反省視角」，在建構出「慰安婦」歷史的同時，亦關注受害國／地區之歷史、文化脈絡，避免同質化各國／地區的「慰安婦」歷史及受害者，以呈現出受害國、受害者的多元樣貌。

四、各國及地方特展的展覽結構與內涵分析

分析 wam 曾經舉辦過的地區型特展，可歸納出展示架構主要分為3部分，以順敘的方式時序性地陳述戰前、戰時至戰後的「慰安婦」事件，以下依序探討。

(一) 揭露日軍戰時罪行

首先，是以第三人稱觀點敘述該地歷史及文化，並說明日軍的侵略戰爭及「慰安婦」制度（包含慰安所地圖）之設立。

在描述日本的侵略戰爭時，並不避開其戰爭罪行，例如在「菲律賓」特展中，便以著名的「巴丹半島死的行進」為例，指出日軍以不人道的方式虐待美國籍和菲律賓籍戰俘（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2011: 11）；在「沖繩」特展中，亦明白指出沖繩戰中，日軍視居民為間諜而將其集體虐殺，或強迫沖繩居民集體自殺（集團自決）以避免洩露軍方機密等殘暴罪行（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2012）。該展區並以居民的口述證言或以日軍戰地日記，說明「慰安婦」制度之設立概況，輔助史料以再現歷史。而慰安所地圖也是每次地區特展不可或缺之要素，F-03 於訪談時提及：「只有文字的話，無法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地圖的視覺性可以在大腦意識當中留下具體的印象。」由此可知，wam 藉由圖像建構觀眾對「慰安婦」的歷史認知。

(二) 加害與被害證言交織出人權教育理念

地區型特展的第二部分，通常為「展示證言的空間」，以受害倖存者的個人生命史為展示主體，輔以處於加害者位置的前日軍證言，由此敘說日軍的性暴力實況。如前述，wam 的目標之一為成為傳承「慰安婦」受害者記憶之場域，但性暴力的創傷很難以影像的方式呈現，因此，wam 將重點置於受害者的口述，期望觀眾可以透過她們的證詞，理解其受害情況、其所背負的人生苦難、與家人間的關係以及終於挺身而出指控日本暴行的心境轉折等等，進而感知每位受害者的生命樣貌。展示中以 A1 大小的展板，以第一人稱觀點敘述受害女性之證詞及其三階段的生命史：首先為受害女性「我」受害前的生活概況，其次則為被迫成為「慰安婦」、在慰安所中的受害情形，最後則是1990年

代之後為了回復尊嚴而出面證言之心境轉換，及其所企盼的正義。

展區中亦透過展示物件來象徵受害者的人格（陳佳利，2007b），然而，與一般戰爭、人權紀念館相異之處在於 wam 所展示的皆非「見證」受害當下、作為受害「證據」之物件，而是受害者於戰後所使用的物品，或是身心療癒工作坊之作品，或是手工藝術作品。對此，F-03 表示：

在博物館中，實物是重要的，物件可以傳遞許多事，但 wam 裡面沒有涉及「慰安婦」的性暴力被害的物件，只有被害者證言，因為她們（由受害處）帶回家鄉的物件很少，所以沒有歷史性的物件。

然而，非「見證」受害當下的歷史性物件仍然能夠承載創傷記憶、表徵受害女性的人格。例如在「臺灣」特展中，便展出受害倖存者於身心療癒工作坊中，詮釋自我創傷的作品。在此，物件並非作為災難的證據，而成為受害者堅韌面對創傷之見證。而在「沖繩」特展中，則以裴鳳基於戰後所使用的物品——剪成小塊以貼於太陽穴上的止痛貼布——再現其與創傷共存的生活經驗。wam 企圖藉由受害者對其受害情況和心境的自我陳述及詮釋來建構觀眾之同理心，誘導觀眾發展「不能重蹈戰爭覆轍」之觀念，以達人權教育。

另外，前日軍的證言亦以第一人稱觀點進行敘述，與受害者個人生命史展示不同，前日軍之證詞聚焦於「戰爭當下之體驗」，或描述戰場上的恐怖景況，或說明慰安所中女性所受之不入道對待，或自我剖析日軍的「強姦依存症」從何而來，或自白其於南京大屠殺中犯下的性暴力罪行。不論內容為何，前日軍言語皆透露出對日本戰爭罪行的反省心態。並列前日軍及受害者證言，除了使加害與被害可以相互對照、建構出女性在慰安所中受害情形

之真實樣貌之外，更以當事者現身說法的方式，讓民眾判斷「慰安婦」事件究竟是否真若日本政府及右翼份子所言，「過程不涉及強制徵集」、「『慰安婦』僅僅是賣春婦」等偏頗觀點。

（三）當代「慰安婦」倡議運動

地區特展的最後一部分則回到第三人稱觀點，以女性為主體，描述各地區戰後社會概況、受害者的對日訴訟及引介各國保存、傳遞「慰安婦」創傷記憶的人權倡議運動。由於 wam 的核心理念是「反對政治性暴力」，因此，除了反省日軍的性暴力外，亦描述各地區戰後的社會概況，並不分國界地揭露戰後於各地發生的性暴力。例如在「菲律賓」特展中，對於戰後美軍於菲律賓的性暴力，以及至今仍存在的「買春觀光」則採取譴責的態度；在「沖繩」特展中，亦以大量的受害者或目擊者證言建構美軍施加於沖繩女性的性暴力，透過向觀眾傳遞性暴力的「實況」，引發觀眾的同理心，並以超越國界的立場，譴責各國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脈絡下所產生的性暴力，藉此反思戰爭與暴行所產生的女性人權侵害，以達致人權教育意涵。

另外，即便有許多受害者出面證言，但在日本政府迴避戰爭加害罪行的情況下，所有「慰安婦」受害者對日訴訟的結果皆敗訴定讞，有些受害者證言甚至無法獲得「事實認定」（不被認為是事實），對此，wam 則透過展示表達其不認同的態度。例如在「臺灣」特展中，針對法庭拒絕給予「事實認定」，故「駁回、不受理申訴」的無情判決，則直接引用受害者所言：「我們沒有錯，錯的是日本政府」，再一次向觀眾強調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

綜上所述，「日本於戰爭時侵害女性人權的歷史真實性」以及「日本作為加害者」的事實，是 wam 想要傳遞給觀眾的主要訊息。另外，wam 也超越國族本位主

義，以「普世人權」¹⁷的概念觀照、反省並譴責「慰安婦」制度，透過性別、人權的視角審視歷史，將目光由「受害者的恥辱感」轉向「加害者的性犯罪」（胡澎，2007: 123），藉此反思日本戰時及當代仍然存在於各地的性暴力，以達致女性人權教育理念。

wam 的社會意義

在國族主義史觀影響日本當代社會之歷史想像的情況下，wam 在「慰安婦」歷史及人權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下，將以 wam 與學校教育的互動、wam 的社會教育意義為核心，進一步的說明與分析。

在國族主義史觀影響日本當代民眾看待歷史及「慰安婦」制度的脈絡之下，wam 透過史料的提供及詮釋，成為彌補與瞭解日本歷史教育中所缺失的、與「慰安婦」制度相關的歷史。研究者於田野研究期間發現有多位高中及大學教師帶領學生前往參觀，對此，F-02 在訪談中表示曾有教師要求學生至 wam 參觀並撰寫參訪心得、亦有教師在教授「慰安婦」議題前致電 wam，尋求教學建議，F-02 建議他直接帶學生前往參觀，由館方提供導覽和相關資料。在與學校教師的互動過程中，F-02 對 wam 所扮演的角色有這樣的看法：

其實 wam 的教育並不只是由 wam 直接傳遞訊息，wam 也很重視與學校老師之相遇，很重視這樣的連結。日本的教科書沒有提及「慰安婦」議題，現世代的教

師們，多是沒有從教科書中學習過「慰安婦」議題的教師，他們自身也不清楚這個議題。……以現況而言，在日本教科書多沒有記述（「慰安婦」議題）的情況下，wam 可以作為向學校教師們提供教材、教學方法的場域，我認為這是 wam 很重要的角色之一。

由此可以發現部分教師認可 wam 在「慰安婦」議題上的專業知識，而 wam 則藉由提供史料、導覽和座談，成為學校教師教授「慰安婦」議題的後援。

研究者田野研究期間，正值大阪市長橋下徹對「慰安婦」議題的一連串負面言論¹⁸。橋下徹的發言除了引起 wam、「慰安婦」支援團體及女權團體的批評之外，亦再度將「慰安婦」議題牽引至大眾面前，成為民眾關注「慰安婦」議題的契機。F-04 於訪談中表示，在橋下徹發言的影響下，wam 的參觀人次上升，大部分為不瞭解「慰安婦」歷史、對此議題尚未存有定見的觀眾，其中顯著上升的觀眾群以背景為學生者居多。除了認同 wam 理念的觀眾以及未持定見的觀眾之外，研究者亦曾於 wam 中遇見對展示內容持反對意見、贊同橋下徹發言的二名男性觀眾，年齡分別為二十多歲及六十多歲。六十多歲的男性觀眾在觀展後強烈表達他對展示內容的不滿，強調這些是「不實情報」，然後詢問 wam 是「在什麼政治背景下成立的？」、「背後是哪個政治家在支持？」。當時另一位認同 wam 展示觀點的五十多歲女性觀眾則出面與該位男性觀眾辯論「慰

¹⁷ 根據聯合國所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之第一、二條，「人權」（human rights）最普遍的定義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且「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財產、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其他出身、身份等任何區別。」見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瀏覽日期：2014/02/25）。

¹⁸ 橋下徹發表「慰安婦」必要論，指出「先不管好壞，為維持軍隊的規律，（「慰安婦」）在當時是有必要的。」見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3051400149.html>（瀏覽日期：2014/02/22）。

安婦」議題的真實性及人權侵害問題，她更表示「這些不是假的，證據都在那裡（特展內容）。」男性觀眾的反應顯示出在日本當代社會中，「慰安婦」議題仍被部分民眾視為政治問題而非人權問題；而女性觀眾的反應則呈現出 wam 在歷史省思及人權教育之初步成果。

二十多歲的男性觀眾則在館內表示支持橋下徹的發言，他更以不小的音量表示「這些人（「慰安婦」受害者）根本只是死要錢（賠償金）」，嘗試影響其他觀眾的想法。當日 wam 內有一批早稻田大學的國際交換生前往參訪，其中一位德國籍交換生針對該位觀眾的言論提出他的疑問：「我不太清楚這些人是不是為了錢，不過我疑惑的是，她們年紀都很大了，就算拿到賠償，可能也用不太到，所以我認為應該思考除了錢之外，她們要的是什麼。我不太清楚日本的歷史教育是怎麼樣，但是德國人都很清楚德國納粹的歷史，因為理解了這樣的歷史之後，才可以避免未來不再發生。」當下，該位男性觀眾沒有再做回應，在此，wam 提供了相異觀點對話之契機，成為多元社會之論壇。

研究者後來嘗試與該位二十多歲的男性觀眾談話，談話中他表示「若日本政府承認了『慰安婦』制度之強徵罪行，那麼日本的後代子孫，在國際間將會抬不起頭來」，此想法與當代日本右翼國族主義復興運動者類似，認為日本人若持續活在「自虐」史觀中，不對自身的歷史感到驕傲，則無法成為一正常的國族、無法擁有正常國家（陳宜中、蔡孟翰，2005）。這樣的社會氛圍亦不同程度地影響日本各地和平紀念館戰爭史的展示史觀。以位於東京都新宿的「和平祈念展示資料館」（以

下簡稱和平祈念館）為例，該館是由日本總務省所轄，以獨立行政法人¹⁹的方式設立，資金源自國家預算，因此，和平祈念館的設立脈絡可說是政府政策之一環。其常設展總說提及其目的為：「為了加深國民理解二戰以後，士兵、被強行拘留者以及海外歸國者的辛勞，並在此基礎上祈禱將來的和平。」和平祈念館雖以年表方式呈現戰前至戰後的軍事、外交及常民生活情況，卻不探討侵略戰爭發生的原因，亦僅強調戰場的殘酷以及日軍戰後成為戰俘受虐的情況，且迴避論及日本的戰爭加害行為。和平祈念館展示將觀眾的視角聚焦在士兵在戰場上的辛勞、在戰後被強行拘留在西伯利亞從事勞役的戰俘所受到的不人道對待，以及日本戰敗後滯留海外的日人在外地的生活，或其歸國途中所遭遇的惡劣情況，而全然未提日本在二戰期間的戰爭加害行為，這可能導致不熟悉二戰史的民眾誤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僅是受害的一方，無任何發動戰爭的罪責。對於這類政府所設置的紀念館，F-02 在受訪時以廣島的兩座博物館展示為例，說明國／公立博物館的展示史觀與行政層級之關係：

以廣島為例，廣島市所營運的市立博物館和國立的原爆紀念館的館址相當接近，廣島市所營運的、所展示的是由軍隊的、武器的角度分析廣島成為投下原子彈的地點之原因；當時廣島是軍隊駐紮重地，因此，以此強調日本軍的責任，除此之外，亦展出在廣島原爆中受災的中國人、韓國人等，呈現除了日本之外，亦有其他國籍的人民受害。廣島市的資料館，並不僅展示日本被害的歷史，而亦展出日本軍隊的戰爭責任；然而，距離不遠的國

¹⁹ 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是指將部分業務由政府行政機關當中分離，並賦予實施單位法人資格，期望透過單位自治，以提昇政策執行之品質及效率。見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gyoukan/kanri/satei2_01_01.html（瀏覽日期：2014/05/09）。

立原爆紀念館所展示的卻完全不同，僅呈現出被害，但這可能也與所屬層級越高、學藝員越無法保有自由展示之理想有關。距離國家權力越近的機構，便會受到國家意見的影響，而隱藏加害的歷史。

另外，再以位於靖國神社內的「遊就館」為例，遊就館常設展以日本「武的歷史」為核心，順敘式地展出日本明治維新至近代「大東亞戰爭」之歷史。館名自荀子〈勸學〉：「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中，取「遊、就」二字，期望觀眾「學習這些為了國家而奉獻出珍貴生命的英靈所遺留的美德」，並且在「直接接觸英靈的精神（みこころ）與事蹟之後，學習作為日本人不應遺忘的事件與歷史」（靖國神社，2013: 5）。展示中所提及的「英靈」，則必須回到靖國神社祭祀的脈絡來看。靖國神社在明治天皇示意下建構而成，戰後遵循日本憲法政教分離之原則，於1952年改組為宗教法人²⁰，主要祭祀自幕府末期以降至日本近代，為日本作戰、因戰爭（包含日本所發起的對外侵略戰爭）而歿的日本軍人，並將戰歿日軍尊為「國家的守護神」、「護國英靈」（靖國神社，2013: 28），神格化戰歿的日軍。然而，神社當中亦供奉二戰之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被審判為有罪的各級日本戰犯，因此，靖國神社往往被視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遊就館承襲靖國神社神格化戰歿日軍之精神，在展示中亦將其聖潔化，歌頌其為國犧牲之行為，在展示中亦開闢4個展示室，主要展示二戰期間的特攻隊員和戰地女性（如看護婦、在軍需工廠勞動的女性等）的遺書，強調其「視死如歸」、「為

國捐軀」之情操，卻全然未提及日軍在二戰期間違反人道的作為，研究者認為此舉反映了「以日本為榮的歷史認知」之右翼歷史觀。

針對日本對外侵略戰爭，遊就館的展示則呈現出歷史正當性，例如占據常設展四分之一比例的大東亞戰爭之展示中便指出，蘆溝橋事變後，美國總統所發表的「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暗示了其對日本之譴責態度，此舉亦誘導了國際社會輿論之傾向。其後，美國議會及輿論皆支持廢止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等對日制裁行為，最終導致戰爭之直接原因則是美國禁止石油輸出日本，且日美交涉談判失敗（靖國神社，2013: 72-75）。遊就館展示將大東亞戰爭的起因歸因於美國對日本的能源禁輸制裁，彷彿大東亞戰爭是對於美國能源禁輸之正當回應，卻未反省造成能源禁輸之根本原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此外，在大東亞戰爭展示之末，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各國獨立」為展題，概要地呈現印度、菲律賓、越南、緬甸等國的獨立運動進程，並有下列展示敘述：

日俄戰爭的勝利，帶給世界、特別是亞洲人獨立的夢想……然而，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亞洲民族的獨立之路亦未開展。亞洲民族的獨立之所以得以實現，皆因日軍在大東亞戰爭中擊倒殖民地政權。即便日本戰敗，日軍占領之下所燃起的火燄，亦不會消逝，在經過獨立戰爭之後，各個民族國家相繼誕生（靖國神社，2013: 107）。

上述的展示論述嘗試將亞洲各國獨立運動歸功於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之理

²⁰ Saaler (2005: 34) 認為，雖改組為獨立宗教法人，靖國神社之歷史觀看似與國家史觀沒有直接關聯，然而「通過這些參拜活動，靖國神社將成為國家回憶政策的組成部分，神社歷史觀也被獲准成為日本的另一種歷史觀——因為通過他的參拜行為，日本首相沒有同神社歷史觀劃清界限，同時還放棄了參拜其他紀念館的（唯一）可能」。

念，藉此強調並美化大東亞戰爭的正當性。遊就館展示弱化日本在美國能源禁輸政策之下，侵略東南亞國家以奪取能源之目的，而將侵略東亞國家解釋為「解放東亞殖民統治」，以此規避發動戰爭之罪責。

因此，相對於日本國／公立等受到政府主導的和平紀念館和體現右翼歷史觀之遊就館，由民間成立且不接受來自任何企業贊助的 wam 有更彈性的空間展示異於國家主流的戰爭史，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以及和平紀念館試圖建構國族主義史觀的脈絡之下，wam 的社會意義之一便在於其建構了異於主流的戰爭反省史觀，向民眾傳遞日本的戰爭責任。

除了作為日本民眾理解「慰安婦」歷史之途徑外，wam 亦成為一國際間「慰安婦」議題對話的空間，其與各國「慰安婦」支援團體及女性人權組織密切合作，除了展示內容的研究外，亦在每次地區特展時邀請熟知該地文史的學者舉辦相關講座或活動，促進國際婦權組織的團結，以使觀眾理解國際間「慰安婦」議題之脈動。以臺灣特展為例，展示期間便邀請臺灣「慰安婦」倖存者陳蓮花及婦援會至東京舉辦「蘆葦之歌」紀錄片放映會，會後開放座談，讓參與者得以透過對談方式更加瞭解臺灣「慰安婦」議題之現況。此外，wam 更作為一訊息的集散地，廣泛蒐集日本各地「慰安婦」相關新聞及活動，公告於網站，並發信通知會員，以使關注「慰安婦」議題的民眾得以接收更多元的訊息，而會員自身也會利用這個網絡交換「慰安婦」及其他人權議題的相關情報，例如掃瞄地方／外國報導並轉寄和相互討論。綜上所述，wam 的社會意義在於其透過國內和國際間的串連，嘗試將在日本屬於邊緣的「慰安婦」歷史揭露在大眾面前，以建構一反思戰爭、促進人權的場域。

結語及建議

戰時的犯罪都是應該受到懲罰的，然而在戰爭現場，對女性的性暴力卻呈現出理所當然的姿態，這反映了對女性的歧視。因此，日本部分民間團體以無比的勇氣，堅持籌備博物館、召開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以控訴在戰場上被無罪化的性暴力罪行。在日本當代社會脈絡之下，wam 實際上揹負著釐清戰時加害歷史的責任，並透過廣泛蒐集、展示被害及加害的證言，明確指出日本對女性施以性暴力的戰爭罪行應該負起法律責任，其反省自己國家的戰爭罪行，已超越國族本位主義。除此之外，wam 也透過與各國「慰安婦」支援團體的合作、跨國界地反省女性受暴的歷史，讓觀眾認知戰爭中的「慰安婦」制度並非日本與單一國家間之歷史問題，而涉及國際間普遍反對的奴隸制度及普世人權價值，藉此發揚「慰安婦」受害者的人權聲音，以促進人權教育。

然而，受限於空間，wam 的特展以展板為主要展示手法，物件展示所占比例不高，為了使觀眾對「慰安婦」議題可以有較完整的認知，因此展板內容的文字量不少，且大部分皆為直述句。在展示弱勢或爭議性議題時，博物館負有扭轉污名的責任，因此，應採取更具政治立場的態度，並作為不同意見之溝通橋樑，以建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陳佳利、城菁汝譯，2003）。然而，在此同時，博物館亦應對於爭議性議題所可能引發觀眾參觀經驗的高度差異性有所體認，在此基礎上更謹慎地處理展示論述。在日本當代社會仍然對「慰安婦」議題存有高度爭議的情況下，研究者認為，過度直述日本戰爭罪行容易引發持反對意見之觀眾強烈的抗拒心理，在人權教育上可能招致反效果、深化歧見之對立。此外，既定的直述句和現有的展

板展示手法也可能使觀眾僅是被動接受展示訊息，以研究者自身經驗而言，參觀過程更像是在閱讀一本「慰安婦」議題的專書，為單向地接收館方所提供的資訊，觀眾的參觀經驗仍停留在傳統博物館的溝通模式——觀眾被動地吸收策展方所傳達的訊息 (Hooper-Greenhill, 1999)。因此，建議在展示當中適時加入問句，並嘗試以觀眾思維之角度設計引發興趣的問題、輔以互動式或引發觀眾思考的展示手法，此舉除了能為觀眾保留獨立思考的空間，使觀眾不僅僅是被動吸收，而能成為知識建構的主體之外，亦能避免過度直接表達館方立場而引發爭議。

Carter 和 Orange (2012) 認為，在博物館已由傳統體現理念的客觀類型轉向以帶有具體目的（如激發觀眾反思）的議題式為主之情況下，博物館不應僅僅再現人類經驗，而應體認自身作為一社會參與的機構，在道德的基礎上主動有所作為。wam 嘗試利用其「博物館／資料館」的形式，

擴展「慰安婦」史實及日軍的戰時罪行，亦成為一「慰安婦」支援運動之活動據點。雖然 wam 在日本當代社會之中仍然面臨許多相異觀點的挑戰，然而，其仍然基於反省戰爭責任與跨國界道德的態度，勇於挑戰日本國族主義史觀，藉此影響當代社會對「慰安婦」議題以及對戰爭罪行之觀點。因此，與大部分日本國／公立的博物館／紀念館相異，wam 展示「慰安婦」議題並非為了建構以「國族」為本位的歷史認同，而是嘗試平反社會對於遭受性暴力之女性的歧視觀點，並建構觀眾對女性人權價值之認同。

誌謝

本文曾於「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2014 臺北年會：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研討會發表，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細心審查，並給予寶貴建議。

參考文獻

- 山下英愛譯，尹貞玉原著，1992。朝鮮人女性がみた「慰安婦問題」：明日をともに創るために。東京：三一書房。
- 甘懷真，2009。臺灣與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之比較，歷史教育，14: 151-170。
- 吉見義明，1992。從軍慰安婦資料集。東京：大月書店。
- ，2005。從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書店。
- 朱德蘭，2010。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出版社。
- 池田惠理子，2004。「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建設委員会のこの1年，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ニュース，4: 4。
- ，2005。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へようこそ！wam だより，1: 1。
- ，2006。開館から1年、wam へのご支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wam だより，3: 1。
- ，2012。日本軍「慰安婦」制度の記録と記憶を継承する闘い，收錄於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編，第11屆日軍慰安婦問題亞洲團結會議「慰安婦議題之教育與歷史傳承」會議手冊，未出版。

- 西野瑠美子，2003。資料館建設実現に向けて，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ニュース，1: 1。
- 李國生，1999。性與戰爭：殖民政府對臺籍慰安婦的動員，收錄於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臺灣慰安婦報告，頁：3-6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和田春樹，1999。政府発表文書にみる「慰安所」と「慰安婦」—『政府調査『従軍慰安婦』関係資料集成』を読む—，收錄於財団法人女性のためのアジア平和国民基金「慰安婦」関係資料委員会編，「慰安婦」問題調査報告・1999，頁：7-31。東京：女性のためのアジア平和国民基金。
- 後藤乾一、高崎宗司、和田春樹編，1997。政府調査「従軍慰安婦」関係資料集成 1。東京：龍溪書舎。
- 胡澎，2007。性別視角下的「慰安婦」問題，日本學刊，5: 116-127。
- 曹欽榮，2011。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
- 陳佳利，2007a。生命中不可再現之痛：論戰爭紀念博物館之展示與敘事策略，博物館學季刊，21(1): 45-59。
- ，2007b。被展示的傷口：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 陳佳利、城菁汝譯，Sandell, R. 原著，2003。博物館與社會不平等的爭鬥：角色、責任、抗拒，博物館學季刊，17(3): 7-23。
- 陳宜中、蔡孟翰，2005。國族復興運動在日本，二十一世紀，89: 128-132。
- 黃玉燕譯，千田夏光原著，1996。慰安婦。臺北：聯經出版社。
- 楊雅慧，1994。日據末期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以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董思齊，2005。「消失到再現」：跨疆越界串連的「慰安婦」議題，日本綜合情報，5: 57-65。
- 雷麗平、周嘉，2006。試論日本歷史認識形成的教育及文化因素，現代日本經濟，147: 54-56。
- 靖國神社編，2013。靖國神社遊就館圖錄：ゆうしゅうかんずろく。東京：靖國神社。
- 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臺灣慰安婦報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賴采兒、吳慧玲、游茹棻、Sheng-Mei Ma，2005。沉默的傷痕：日軍慰安婦歷史影像書。臺北：商周出版社。
- 蘇智良，2006。「大一沙龍」：第一個日軍「慰安所」，百年潮，8: 76-79。
- VAWW-NET ジャパン編，2002a。Q & A 女性国際戦犯法廷「慰安婦」制度をどう裁いたか。東京：明石書店。
- ，2002b。女性国際戦犯法廷の全記録Ⅱ。東京：緑風出版社。
- 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2008。日本軍「慰安婦」学び、調べ、考えよう。東京：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
- ，2010。証言と沈黙：加害に向き合う元兵士たち。東京：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

- , 2011。フィリピン・立ち上がるロラたち～日本軍に踏みじられた島々から～。
東京：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
- , 2012。軍隊は女性を守らない～沖縄の日本軍慰安所と米軍の性暴力。東京：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
- Carter, J. and Orange, J., 2012. Contentious terrain: Defining a human rights museology.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7(2): 111-127.
- Coomara-swamy, R., 1996.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4/45. (未出版)
- Hooper-Greenhill, E., 1999. *The Education Role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 Hung, T. H., 2007. Feeling for “comfort women”: Performing human rights discourse in Asia/America.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3(2): 99-125.
- Saaler, S., 2005。日本の政治、回憶和歴史意識，二十一世紀，90: 32-37。
- Williams, P., 2007.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Oxford: Berg.
- Yamane, K., 2010. Yayori Matsui and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Social Alternatives*, 29(1): 25-28.

網路資料

- 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建設委員会ページ。檢索自：<http://www.wfphr.org/pre/sub/intro.html> (瀏覽日期：2014/02/09)。
- 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網站。檢索自：<http://wam-peace.org/> (瀏覽日期：2014/02/10)。
- 日本外務省網站，戦後 50 周年の終戦記念日にあたって (いわゆる村山談話)。檢索自：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07/dmu_0815.html (瀏覽日期：2014/02/03)。
- 日本総務省網站，独立行政法人とは。檢索自：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gyoukan/kanri/satei2_01_01.html (瀏覽日期：2014/05/09)。
- 中時電子報，2013/05/14，橋下徹：二戰時・慰安婦是必要的。檢索自：<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3051400149.html> (瀏覽日期：2014/02/22)。
- 国会會議録網站，第 118 回国会予算委員会第 19 号。檢索自：<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18/1380/11806061380019a.html> (瀏覽日期：2014/01/23)。
- ，第 136 回国会予算委員会第 3 号。檢索自：<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36/1380/13602161380003c.html> (瀏覽日期：2014/02/04)。
- ，第 166 回国会予算委員会第 3 号。檢索自：<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66/0014/16603050014003a.html> (瀏覽日期：2014/02/04)。
- 産経新聞，2014/1/17，教科書檢定基準を改正・近現代史で文科省、政府見解を明記。檢索自：<http://sankei.jp.msn.com/life/news/140117/edc14011711250001-n1.htm> (瀏覽日期：2014/01/24)。
- 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つくる会網站，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つくる会趣意書。檢索自：<http://www.tsukurukai.com/aboutus/syuisyo.html> (瀏覽日期：2014/01/25)。

ICMEMO 網站。檢索自：<http://icom.museum/the-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of-remembrance-of-the-victims-of-public-crimes/>（瀏覽日期：2014/02/03）。

United Nations 網站，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檢索自：<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瀏覽日期：2014/05/13）。

作者簡介

丁巧如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Transcending Nationalism: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Rethinking of Human Rights by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in Japan

Chiao-Ju Ti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establishment of memorial museums ha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a field of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tic memories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However, the history of “comfort women”, meaning women who were sexually exploit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remained hidden until Hak-Sun Kim, a South Korean survivor came forward in 1991. Since then, survivo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told their stories. Howev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constantly denied responsibility and removed the narrative on “comfort women” from history textbooks. In response, Japanese civic groups have been working to co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comfort women”.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opened in 2005 in an attempt to carry out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transcend the nationalist perspective through exhibitions that highlight the issues of and that convey the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comfort women”.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advocacy movements of, as well as to describe the attitudes of Japanese society toward, “comfort women”. In addition, connotations of exhibitions and conceptions of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are investigated through interviews and analyses of exhibitions. By analyzing the way museums rethink traumatic history and implement cross-country cooperation, as well as outlining the introspective attitudes of Japanese civic groups’ toward war crim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seum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rethinking of human rights can be explored.

Keywords: exhibition of “comfort women”, museums and the human rights of women, education on human rights, traumatic history

*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ghosthithewall@gmail.com